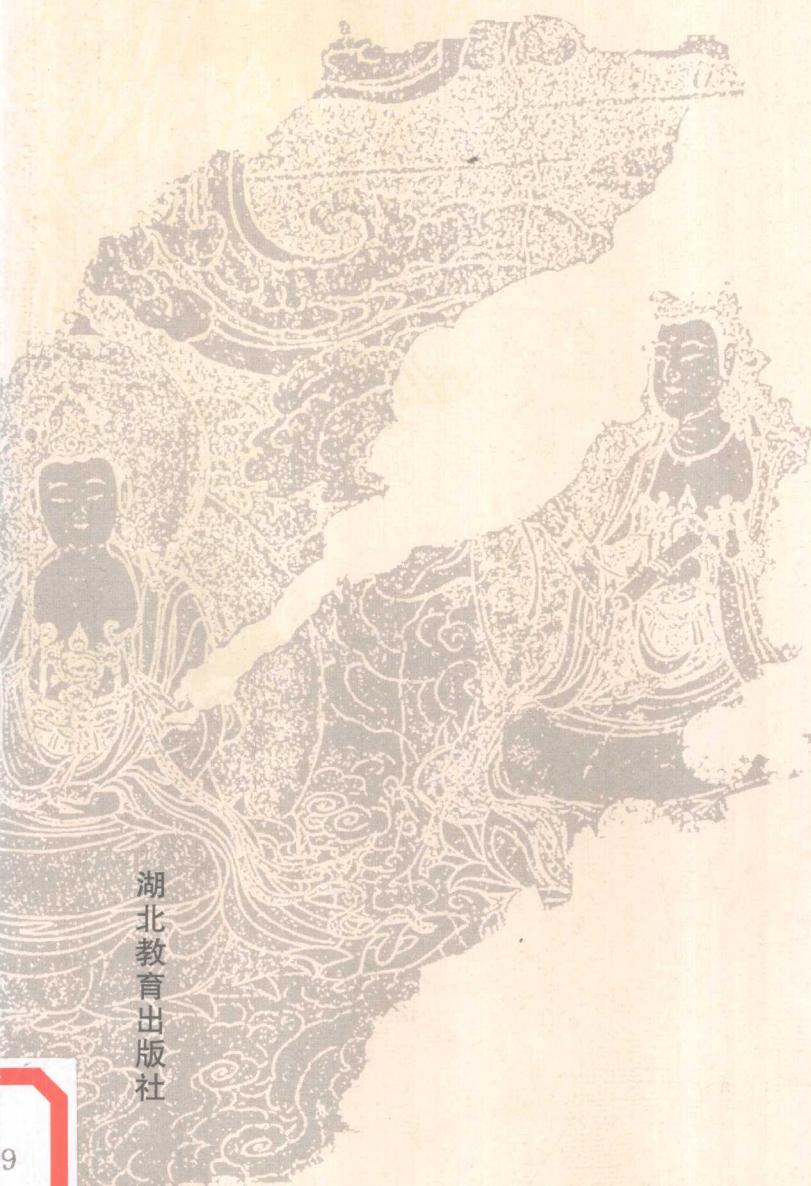


博雅文学论坛
BOYAWENXUELUNTAN
高文强 著

与佛教
永明文学批评



湖北教育出版社

1326484
与永明文学批评

佛教

高文强 著

武汉大学文学院
武汉大学汉语言文学典籍整理与研究中心
资助出版

湖北教育出版社

(鄂)新登字 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GIP)数据

佛教与永明文学批评/高文强著.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6

ISBN 7-5351-4543-4

I.佛…

II.高…

III.佛教-关系-永明体-文学批评史

IV.I207.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25465 号

出版发行 湖北教育出版社

邮政编码 430015 电 话 027-83619605

地 址 武汉市青年路 277 号

网 址 <http://www.hbedup.com>

经 销 新 华 书 店

印 刷 武汉中远印务有限公司

地 址 武汉市硚口区长丰大道特 6 号

开 本 965mm×1270mm 1/32

印 张 6.75

字 数 187 千字

版 次 2006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351-4543-4/I·

定 价 16.00 元



高文强，1969年3月生，湖北孝感人。
2004年6月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文艺学专业，获文学博士学位。现为武汉大学文学院讲师。在《古代文学理论研究》、《文心雕龙研究》、《宗教学研究》等刊物上发表论文十余篇，出版专著两部。

责任编辑：魏天无 鞠继元

装帧设计： 金钟工作室



学术研究的乐趣，在深思与发现。

博雅文学论坛，收录中国现当代文学、
文艺学等学科青年才俊最新研究成果，以细
读为基础，以深思为导引，以发现为旨趣。
学求博识，文求雅正。

本论坛不求体系之完备，规模之显赫。
有引以为同道者，则择善而行。

已出版：

- 革命历史图景与民族国家想象
- 新诗现代性追求的矛盾与演进
- 中国文学批评现代建构之反思
- 佛教与永明文学批评

序一

王先霈

近一二十年来，佛学研究受到不少人文学者的关注，出现了许多可喜的成果。而在以前的某个时期，它曾经被轻视、甚至被排斥在研究课题领域之外。五十年代，有一位德高望重的史学大家，在他的代表性的著述中，用激烈的言词对佛教和佛学作过简单化的全面否定。到了晚年，经过审慎反思，得出新的看法，他说：“在中国历史上，佛教和文化关系如此之深，不懂佛学就不能全面弄懂中国文化。”（见1986年第10期《文史知识》所载赵朴初先生文章的引述）这位前辈没有来得及开拓这个方面新的研究，而新一代的学者在新的良好的学术环境下，把佛学研究推进到新的阶段、新的高度。

高文强以佛教与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关系作为博士学位论文题目，就是在近年学术界先进们影响下作出的选择。他为此作了很长时间的准备，为确定具体写作范围和角度，更经过反复思考。做这个题目当然要应对很多、很大的困难，要研读很多的佛学和古代文论的典籍，对于年轻的高文强来说不是轻松的事，可是他乐此不疲。古人所说的“无望其速成，无诱于势利”，在今天的环境中，在当前的学术机制下，很难实践。我只能说，高文强写作时的心态，不那么浮躁，默默地攻克一个又一个障碍，拿佛教修行作比方，他算是一个渐悟派吧。我对他的写作态度，颇为赞赏。

佛学与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关系是一个大题目，我一向觉得，学位论文选题宜专不宜泛。这样才有可能力求详尽地占有原始资料，才有可能作较深的开掘。永明年代对于所论问题是具有典型性的，但恰好对这一时段佛学与文论的关系，前人已经作过若干探讨。经过认真分

析，高文强认为，以前学者们讨论的主要是声律论与佛经翻译的关系，而他一方面对声律论的形成与发展的渊源作出了一些自己的补充，另一方面更提出佛教的世俗化对审美俗尚的推动，具体谈到的是沈约的“三易说”与佛学、佛教的关系。开始我对此有些犹豫，担心已有的材料不足以支撑他的论断，在他不断细化和深化他的观点之后，我觉得确实有新意。当然，到目前为止，也需要补充更多直接的、有力的材料，但他不囿于旧说，努力创新，而且肯在材料上下功夫，这就是很不容易的。

做古代文论研究，第一位的是搜集、钻研材料，发掘新的材料，同样重要的是找到新的视角去审查材料，提炼出新颖的、经得住检验的新的观点。高文强是在朝着这样的目标前进。他的论文有新见而并不刻意炫新，踏踏实实一步步做下去。现在，他的学位论文经过修订正式出版，我为之欣慰；他此后更为显著的成绩，是我有信心期待的。

2006年3月25日于武昌桂子山

序二

李建中

当高文强的博士论文《佛教与永明文学批评》即将付梓时，珞珈山的樱花正灿烂着。我在樱顶的老图书馆为高文强的新著写序，眼前簇新的打印稿似乎有一种春的气息；而我身后的藏书室，珍藏着上世纪 20 年代黄侃、刘永济的国学旧著，珍藏着 30 年代武汉大学人文学院主办的《文哲季刊》，上面载有郭绍虞、罗根泽先生的批评史论文。而 1931 年的春天，年轻的朱东润在国立武汉大学讲授《中国文学批评史》，他讲的第一句话是：“中国文学批评史，现时惟有陈钟凡一种……”

2006 年的春天，年轻的高文强博士也在武汉大学讲授《中国文学批评史》。我不知道他第一句话讲的是什么；但我可以想象他的第一个感觉：走进珞珈山如同走进 20 世纪中国古代文论的学术研究史。武汉大学的“中国古代文论”，是珞珈山文学门的品牌学科“三古”（古代汉语、古代文学、古代文论）之一，有着悠久而辉煌的历史。整个 20 世纪，从黄侃、刘永济的《文心雕龙》研究到王文生的《中国历代文论选》，从吴林伯、罗立乾的六朝文论到程亚林、刘良明的诗学及小说理论，形成了血脉相承的学术传统。现在的武汉大学文学院，几乎每个教研室都有研究古代文论的学者，而且大多师出名门，有很好的学术渊源。20 世纪 80 年代，全国有四个中国文学批评史博士点：复旦大学、南开大学、四川大学和陕西师范大学，分别由王运熙、顾易生、王达津、杨明照、霍松林等先生主持；而这几位堪称“大师”的学界先贤，均有弟子在珞珈山上治古代文论。而且，武汉大学也有了自己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博士点。我曾在一本书的后记里称

珞珈山是古代文论研究的“诗性空间”。高文强出道之初便生存于这一诗性空间。高文强是幸运的。

珞珈学人治古代文论，秉承章黄学派的朴学风习，谢彼虚谈，敦兹实学。而这也是高文强做学问的特点。记得是2002年的夏天，我和高文强在保定参加文心雕龙年会，会后游五台山，我们缓慢地穿行于那些历代佛教的丛林，而高文强用更缓慢的语速讲述他的关于六朝佛教与文学批评的博士论文选题。他秉香凝视，身边是游客的匆忙与喧闹，他却在聆听另一个世界的静穆与庄严。在这个用量化方法管理学术的时代，高文强其实还有别的选择；但他最终还是选定了这个难度很大而且出成果很慢的研究领域。言讷，心静，不慌不忙，不急不躁，能坐冷板凳，也甘坐冷板凳。刘勰说“入兴贵闲”，高文强这种性格是最适宜做古代文论的。

纪昀纂修《四库全书》，卷首引刘勰“意翻空而易奇，言征实而难巧也”。研习六朝佛学与永明声律，“言征实”是第一重要的。高文强的这部书，材料搜寻详尽而丰富，颇见其苦功与定力。书中关于“新变”之概述、“三易”之平议、“声律”之辨正，皆能言之有据且言之出新。此外，其入思方式兼及佛理与本土儒道之契合，以及佛典语言及音律在本土文学中之表现；其研究方法则执著于小题大做，力求在较小的开口中获取较深的掘进。当然，作为高文强独立撰写的第一部专著，是书尚有可改进之处。比如，佛学对永明文学批评及其对东汉之后整个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影响，似应在文化背景、哲学思潮、语言文字及声律等不同层面展开，是书在这方面似缺乏辨析，论述中略显缠杂。

在治中国古代文论的珞珈学人之中，高文强是年龄最小的一位，因而能够最多最大地获得前辈学者及师长的指导。我一向认为，做学问不能自学成长，尤其不能缺少先贤及师友的帮助。二十年前，我在桂子山攻读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硕士学位时，就得到诸多师长的教诲和导引：沙湖畔的郁源先生邀我参编《中国古代文论》，珞珈山的罗立乾先生为我的硕士论文撰写评语，而使我受益终生的则是桂子山上我的三位恩师：王先霈、周伟民和曾祖荫。三位先生既有厚实的国学功底，又有对新观念新方法的敏锐感知和透彻解悟，他们治批评史从选

注古代小说序跋开始，继之分别用心理学、比较文学和美学的方法研究古文论。我后来的研究视域、治学方法乃至书写风格，都深受三位先生的影响。刘勰将圣贤的教诲喻为“木铎起”、“席珍流”，正是因为有前辈学人的金声玉振，才会有后世学术的英华日新。二十年后，当高文强在珞珈山出版自己的第一部学术专著时，一定有着与我相似的感受。

此时的珞珈山，满树樱花正悄然飘洒，默默孕育着来年的灿烂。

丙戌年季春于东湖名居心远斋

目 录

导 论	1
第一章 永明士人与佛教	6
第一节 永明士人面临的佛教前提	6
一、佛教与政治的联姻	6
二、士族信仰的转变	12
三、文化的冲突与融合	17
第二节 士人与佛教关系的基本特征	22
一、从个人化到集团化	22
二、士人与佛教关系的三种类型	27
第三节 永明士人的佛教实践	31
一、交游名僧	31
二、参与佛事	38
三、践行教义	41
四、辩护佛理	44
第四节 永明士人的佛学思想	47
一、神不灭论	47
二、三宗论	50
三、同源论	52

第二章 永明文学批评的佛学背景	56
第一节 永明文学批评的新变	56
一、文学审美观念的世俗化	56
二、追求平易流转的艺术风格	59
三、强调声律的和谐搭配	62
第二节 永明文学批评佛学背景之考察	64
一、考察的途径	64
二、语言背景	67
三、观念背景	70
四、思维背景	74
第三节 佛教对文学艺术领域的渗透	77
一、对艺术创作的渗透	77
二、对文学创作的渗透	82
第三章 新变观与佛教	87
第一节 永明文学批评之新变观	87
一、“新变”的提出	87
二、永明新变观的主要特征	89
第二节 佛教传播对新变观念的推动	93
一、佛学东渐与文化趋新	93
二、佛教思想中的新变观念	98
三、晋宋之际新思潮对求新学风的推动	102
第三节 佛教在永明新变观形成过程中的作用	108
一、士庶关系与士人文化心态	108
二、佛教与士人文化心态的转变	113
三、佛教的世俗化对审美俗尚的推动	116

第四章 “三易”说与佛教	122
第一节 “三易”说略论	122
一、“三易”说的提出	122
二、“三易”说的内涵	125
第二节 佛学易风：平易文风和简易学风	128
一、佛教的平易文风	128
二、佛教的简易学风	134
三、玄学之简与佛学之易	138
第三节 佛学易风与“三易”说的形成	140
一、佛教平易文风对文学创作的渗透	140
二、佛学易风对永明文风的影响	145
三、沈约与“三易”说的形成	148
第五章 声律论与佛教	152
第一节 永明声律论辨证	152
一、“四声”“八病”辨证	152
二、声律论的内涵	157
三、声律论兴起的背景	160
第二节 佛教与声韵研究的开拓和发展	162
一、反切之发明与佛教	162
二、四声之发现与佛教	169
三、转读、梵呗、唱导的兴盛与南朝音韵研究的繁荣	177
第三节 佛学东渐对诗歌声病观念及规则的影响	179
一、声律论倡导者的佛学背景	179
二、佛经翻译对诗歌声律研究的推动	184
三、声病观念及规则的理论渊源	191

主要参考文献.....	196
后记.....	201

导 论

一

南朝是佛教发展史上的繁盛期，同时也是文学批评史上的收获期。佛教自两汉之际传入中国，经过近三个世纪的依附性传播，至东晋开始逐步进入士人文化行列，入南朝而成为士大夫间最重要之文化思潮，影响所及包括其时之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士人心态等各个方面。南朝文学批评在批评史上地位尤重。之所以重要，借用郭绍虞先生的话来说，即此时讨论的问题，“空前启后”；文学批评的专著，“传至现代犹自成为空前的伟著”；“各种批评的方式殆无不具备”；“此期的批评家才真是纯粹的批评家”。^①一种文学批评观念的形成，一方面固然是对一时文学创作风气的回应，另一方面，它还常常是其时社会文化思潮在文学批评中的反映。因此，佛教与文学批评在南朝这一时期发生因缘自然是不可避免。研究佛教与南朝文学批评之关系，不仅对六朝文学批评研究具有深化之意义，而且为佛教与中国文学批评关系的研究也可提供参考之价值。不过，基于“小题大作”的原则，本书仅提取南朝四代之一——南齐之永明时期——文学批评作为研究对象，以期对问题的讨论能较深入。

“永明”是南齐武帝年号。公元 482 年齐高帝萧道成病故，子萧赜即位，是为武帝，翌年改元永明，至 493 年武帝病故，永明共历十

^① 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百花文艺出版社 1999 年，第 96 页。

一年。不过，“永明文学批评”所涵盖的时间范围，比作为历史范畴的永明时期要宽泛一些。在文学史的研究中，“永明文学”所指称的文学时段，下限常被推至梁天监十二年（513），也就是永明文学中心人物沈约的卒年，这已是文学史界的共识。^①其原因在于永明文人不少“在永明以后乃至梁初依然活跃一时，他们后来的创作仍然是永明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②。其实，在一特定的文学史时段的多个历史年号中选取某一代表性的年号来指称这一文学史时段，本是文学史研究领域的惯例（如建安文学、正始文学、太康文学等），本书所谓“永明文学批评”便借鉴了这一惯例。所以，“永明文学批评”是指以永明年间为中心，活跃于文坛的那一代文学家的文学批评，他们在永明之前或之后的活动，也在考察范围之内。不过，需要说明的是，这种时限的超出，并非意欲将此一大段时限中的所有文学批评活动都包括在考察范围之中，而是专指永明文人在这一超时限中的活动。

永明文学批评在文学批评史上扮演的是一个新变角色，这使它在六朝文学批评史上成为一个极为重要的转折期。如果说唐人文学繁荣是得益于六朝人创新之荫庇，那么植起第一棵大树者便是永明文人。永明文学批评所取得的成绩是与当时的社会文化环境分不开的。

南齐永明之世，是南朝政治、经济及文化相对稳定与繁荣的重要时期。《南齐书·良政传序》说：“永明之世，十许年中，百姓无鸡鸣犬吠之警，都邑之盛，士女富逸，歌声舞节，袞服华妆，桃花绿水之间，秋月春风之下，盖以百数。”社会的稳定，给永明文人提供了比较舒适的物质条件，使他们能够潜心创作，切磋技艺，总结经验。在思想领域，永明之时环境比较宽松，统治者很少进行干预。这就使得诸家学说能够在比较平等的条件下争鸣，在相当程度上促进了当时思想界的活跃。这种宽松的思想环境使永明文人较少受到传统窠臼的束缚，创新求变，寻求自立，成为他们共同追求的目标。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艺术也获得了长足进步，如能书善画可以说是永明文人的普

^① 参见曹道衡、刘跃进：《南北朝文学编年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第401页。罗宗强：《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中华书局1996年，第214页。

^② 刘跃进：《门阀士族与永明文学》，三联书店1996年，第71页。

遍时尚，这使他们在艺术天地得以获取更多的审美灵感。稳定繁荣的社会文化环境，为文学获得空前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而统治者的进一步提倡最终将永明文学推向了繁荣。正如刘师培所言：“齐梁文学之盛，虽承晋宋之绪余，亦由在上者之提倡。”^① 永明年间竟陵王萧子良开西邸，招文学，集萧衍、沈约、谢朓、王融、萧琛、范云、任昉、陆倕“八友”及永明文人之大部于麾下，形成一个庞大的文学集团，将文学创作推向繁盛。这一切无疑对永明文学批评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不过，对永明文学批评之新变起到关键作用的，还是佛教。佛教在南朝已是“上流士大夫思潮之中心”^②，更为重要的是，永明时期的竟陵集团不仅是一个文学集团，同时还是一个佛学集团。它常组织抄经、讲学、法事等一系列佛教活动，已成为当时最重要之佛教中心。竟陵集团作为文学中心和佛教中心，文学佛学的相互影响正是这一时期文化领域的主要特征。因此可以说，忽略了对佛教影响的研究，我们将无法真正透彻理解永明文学批评的本质。正是基于此点，本书欲对佛教对永明文学批评的影响作全面的讨论。

二

对永明文学批评与佛教关系的研究，最早者是陈寅恪于1934年发表的《四声三问》，其后有逯钦立《四声考》，饶宗颐《印度波尔尼仙之围陀三声论略——四声外来说平议》和《文心雕龙声律篇与鸠摩罗什通韵——论四声说与悉昙之关系兼谈王斌、刘善经、沈约有关诸问题》，蒋述卓《佛经传译与中古文学思潮》中有关四声问题的讨论等。外国学者的重要成果有日本学者平田昌司《梵赞与四声论》，美国学者梅维恒和梅祖麟《近体诗源于梵文考论》等。从这一系列研究成果可以看出一个明显特点，学者对永明文学批评研究大都集中于声律论这一点上。这一方面说明声律论在永明文学批评中的重要地位，

^① 陈引驰编校：《刘师培中古文学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73页。

^② 梁启超：《佛教教理在中国之发展》，见《佛学研究十八篇》，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160页。